

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与空间批判话语的嬗变

张 梧

[摘 要] 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 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是空间批判理论从“隐性逻辑”凸显成为“显性逻辑”的关键要素。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的资本现代积累模式推动了资本同质性空间的建构; 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掠夺式积累模式引发了资本异质性空间的对抗; 而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弹性积累模式导致了资本差异性空间的生产。资本积累模式的变迁不仅是空间批判话语不断嬗变的内在动力, 同时也彰显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对于批判当代空间现象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 马克思 资本积累 空间批判 [中图分类号] B0-0

晚近兴起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因其所具有的双重批判维度, 而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产生了复杂的态度: 一是在社会现实的维度上批判资本主义的空间现象, 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理论在此维度上的批判显然继承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资本批判理论; 二是在思维方式的维度上反思历史决定论思维, 认为“历史决定论是空间贬值的根源”(苏贾, 第31页), 旨在恢复空间在社会批判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值得注意的是, 正是在后一维度上, 空间批判理论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定性为一种服从时间霸权、凸显历史时间的现代性意识形态, 进而认为马克思思想中缺失了空间批判的维度, “马克思经常在自己作品里接受空间和位置的重要性……但是地理的变化被视为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而被排除在外。我的结论是, 他未能在自己的思想里建立一种具有系统性和明显地具有地理和空间的观点, 这因此破坏了他的政治视野和理论”。(同上, 第100页) 问题的关键在于,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存在“空间的空场”?

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空间批判理论对马克思的理论责难, 我国学界的回应方式主要是深入挖掘并呈现马克思理论中有关空间批判的相关思想, 由此证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并未出现“空间的空场”。毫无疑问, 这些学术努力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即丰富并深化了人们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空间化理解, 呈现出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的当代价值。然而, 这种致思路径也存在着一定的困难: 毕竟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显然更为关注时间维度, 如必要劳动时间、流通时间、自由时间等理论构成了马克思思想中的“显性逻辑”; 比较而言, 马克思并未形成系统的空间批判理论, 空间维度的相关批判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始终处于从属性的地位, 因而是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隐性逻辑”。更为重要的是, 这种致思路径往往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直接与当代空间批判话语嫁接, 由此忽略了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与当代空间批判话语之间深刻的时代差异。面对这样的困境, 本文认为, 空间批判之所以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中的“隐形逻辑”凸显为当代空间批判话语中的“显性逻辑”, 在根本上是由资本积累模式的历史性变迁所决定的。根据这一思路, 本文旨

在从资本积累模式的历史变迁透视空间批判话语的嬗变历程，并试图证明，所谓的“空间空场”并非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原罪，而是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必然反映，最终证明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在当代空间批判话语建构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资本积累与同质性空间的建构

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依据资本原始积累与现代积累两种模式的区分及论述，着重勾勒了资本对社会空间确立统治关系的历史进程，这一进程同时是社会空间在资本逻辑的支配下转变为资本空间的过程，即资本同质性空间的建构过程。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积累的实质是将剩余价值转变为资本，资本积累蕴含着深刻的空间效应。正如马克思所说“总的结论是：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697页）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种原始要素与资本的结合，不仅意味着空间被纳入到资本积累过程之中，而且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释放出来的空间必须要按照资本积累的要求而加以改造，即资本同质性空间的建构。

在讨论资本积累的过程中，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意义上的积累：一种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另一种则是资本的现代积累。二者的区别在于，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将非资本的要素转化为资本要素，这是在非资本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展开的积累过程；而资本的现代积累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完成的资本积累，体现的是资本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在对原始积累的讨论中，马克思所关注的焦点问题是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过程。马克思以英国的圈地运动为例，指出原始积累主要通过暴力的方法完成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所有权之间的强制分离。除了暴力手段之外，资本主义社会还通过对非资本主义社会的殖民完成了原始积累。在马克思看来，原始积累的过程其实也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过程，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原先的前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也被整合成了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空间结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对自然的社会统治和社会调节，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同上，第872页）换言之，前资本主义的空间结构是自然界所形成的，其特征是分散性，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空间结构就必须把这些分散的空间整合成为一个内在统一的生产空间，即通过协作、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积聚形成了资本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在分析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提出一个容易被人们所忽略的观点，即马克思严格地区分了“资本的形成史”与“资本的现代史”：“资本的洪水期前的条件，属于资本的历史前提，这些前提作为这样的历史前提已经成为过去，因而属于资本的形成史，但决不属于资本的现代史，也就是说，不属于受资本统治的生产方式的实际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51页）根据这一区分，前资本主义空间在原始积累驱动下向资本主义空间的转变和改造仅仅是“资本的形成史”的产物。空间在资本的形成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和在资本的现代史中所发挥的作用不能等量齐观。在资本的形成史中，传统社会土地关系的解体是资本关系生成的前提；而在资本的现代史中，资本本身就是资本关系的前提，也是资本关系的产物。在此过程中，土地和空间就不再是资本关系不断再生产的物质前提，而是资本关系再生产的内在环节。换言之，在资本的现代史中，资本已经确立了对土地和空间的统治地位。于是，马克思在资本现代积累的视野中把握资本同质性空间的建构逻辑：

首先，机器化大生产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同质化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中详细梳理了协作、分工、工场手工业、机器与大工业等问题。这些环节

作为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变革的环节，也带来了空间的压缩、集中和重组，由此重塑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空间。出于资本的增殖本性，资本在机器化大生产中“为了从空间上夺回在时间上失去的东西，就要扩充共同使用的生产资料如炉子、厂房等等，一句话，要使生产资料在更大程度上集中起来，并与此相适应，使工人在更大程度上集结起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第546-547页）这是机器化大工业重塑资本主义生产空间的最为直接的表现。

其次，资本主义的生活空间服从于生产空间，进而被整合进同质化的资本主义总体空间之中。马克思指出，“资本除了把工厂工人、手工工场工人和手工业工人大规模地集中在一起，并直接指挥他们，它还通过许多无形的线调动着另一支居住在大城市和散居在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同上，第531页）由于生活空间服从于生产空间，所以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城市与中世纪的城市具有了本质上的区别：在中世纪的城市中，由于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生产空间是依附于生活空间而布展；而在机器大工业时代，生产空间则统辖了工人的生活空间，工人的生活空间乃至生存境遇进一步恶化，这正是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中所描绘的悲惨图景。

最后，在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重组完成后，资本主义同质性空间向全球扩展。随着世界市场关系的全面布展，世界市场空间反过来强化了资本主义大工业时代的生产空间，而且使得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生产空间开始植入全世界各地，由此形成了“世界工厂”。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资本同质性空间对外扩张的动力机制是“时间消灭空间”。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一方面要摧毁交往即交换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538页）所谓“时间消灭空间”，并非是指空间维度的彻底消解，而是指空间在加速流动的过程中不断得以重组。

所以，在资本的现代积累过程中，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从生产空间到生活空间、从地区空间到世界空间都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即变成了资本主导的同质化空间，这正是自由竞争时期资本主义的空间效应。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马克思所处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时间维度比空间维度更为重要。这并非出于马克思对所谓“历史决定论”的偏好，而是出于资本积累逻辑的现实考量，因为时间维度直接关系到价值的量化，直接关系到资本的生产过程。

由于资本积累是空间整合的内在动力，因此在马克思之后，无论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列宁和卢森堡，还是晚期资本主义的列斐伏尔和哈维，资本积累理论始终是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空间现象的一把钥匙。在随后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中，虽然资本积累的模式在不断变化，空间图景也随之改变，但是资本积累理论对于社会空间的支配作用仍然有效。因此，无论资本逻辑的现实展开过程如何变化，只要资本逻辑的主导地位没有发生变化，那么马克思关于资本逻辑与空间现象之间的内在关联的深刻思考，就仍然适用于当代的空间批判。也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的资本逻辑理论为当代社会的空间批判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启示。

二、垄断资本主义掠夺式积累与异质性空间的对立

马克思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深刻揭示了资本逻辑与空间现象的内在关联，但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逻辑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代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并未完全预见到随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的时代特征。在马克思之后，空间批判话语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批判，即资本主义空间对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剥削，这是两种异质性空间的对立。帝国主义的出现，标志着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从自由竞争时期开始转向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根据资本积累理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之所以会出现两种异质性空间的对立，其根源是资本的掠夺式积累模式。

作为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空间批判话语，帝国主义现象分别被列宁和罗莎·卢森堡从两个不同的理论方向加以批判：列宁主要是从资本形态的演变角度揭示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两种异质性空间的剥削关系，而罗莎·卢森堡主要是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揭示资本主义异质性空间的依存关系。

列宁依据资本形态的演变深刻分析帝国主义现象。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不同的资本形态具有不同的空间效应，如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分析了从等级资本到商业资本，继而再到工业资本的资本形态的跃迁过程，认为其中真正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是产业资本，也就是说，在自由竞争阶段起主导作用的资本形态是产业资本。而在列宁那里，占据统治地位的资本形态已经从产业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这也就是垄断资本主义不同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的关键所在。正如列宁所说“20世纪是从旧资本主义到新资本主义，从一般资本统治到金融资本统治的转折点。”（列宁，第38页）

正是由于从金融资本出发，与马克思在资本现代积累理论中的殖民地批判相比，列宁对帝国主义殖民地批判具有鲜明的特色。马克思就现代资本积累方式和夺取殖民地空间之间的关系所进行的分析是在商品资本意义上展开的，而列宁则是在金融资本意义上讨论殖民地问题。列宁指出，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在金融资本主导下争夺原料产地。在殖民扩张下，帝国主义呈现出了资本主义空间对非资本主义空间的剥削关系“金融资本和同它相适应的国际政策，即归根到底是大国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瓜分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造成了许多过渡的国家依附形式。”（同上，第74页）列宁从资本形态的演变出发，对帝国主义进行了彻底的空间批判，这一批判的目的在于召唤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精神。为此，列宁在帝国主义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革命策略，比如殖民地解放与社会主义民主革命相结合的策略，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进行革命的策略，等等。

如果说列宁是从资本形态的纵向维度批判帝国主义，那么，罗莎·卢森堡则是在资本积累的横向维度批判帝国主义。在卢森堡看来，资本积累重要的是解决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问题，而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的条件要有不断增长的生产资料和消费的需求，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不可能来自资本家和工人，只能来自资本家和工人之外的非资本主义生产阶层和非资本主义社会。正是非资本主义的生产阶层和社会，为剩余价值的实现以及随后的资本积累提供了物质形态的生产、消费要素和劳动力要素，或者说，资本积累的实现是以非资本主义国家的存在为前提和必备要素。正因如此，资本的发展必然要求以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排斥简单商品生产，以资本主义国家掠夺非资本主义国家。所以，资本积累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过程“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它具有囊括全球，驱逐其他一切经济形态，以及不容许敌对形态与自己并存的倾向。但是，同时它也是第一个自己不能单独存在的经济形态，它需要其他经济形态作为导体和滋生的场所。虽然它力求变为世界普遍的形态，并正由于此，变为世界普遍形态也是它的趋向，然而它必然要崩溃，因为它由于内在原因不可能成为世界普遍的生产方式。”（卢森堡，第376页）

与列宁相比，由于卢森堡的帝国主义批判更加凸显空间维度，从而对垄断资本主义之后的空间批判话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卢森堡注重从资本的再生产过程出发来看待帝国主义。这是卢森堡帝国主义批判的理论基础。对于全球化而言，从资本的生产的一般性分析是无法真正揭示出全球化的经济机制和内涵的，必须要从再生产出发，也就是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出发。此后，以列斐伏尔、苏贾、哈维、杰索普等为代表的思想家均是在改造卢森堡的扩大再生产概念的基础上对全球化空间实践加以理论阐发。卢森堡的扩大再生产仅仅是物质资料层面的扩大再生产，而没有看到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这正是卢森堡的扩大再生产概念的基本缺陷所在。如果忽略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维度，那么资本积累只能发生在资本主义世界与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按照这种逻辑，卢森堡就势必推演出资本主义崩溃论。事实上，资本主

义在经历了几次危机之后并没有崩溃，而且在全球化时代，资本积累已经涵盖了全球化范围，真正意义上的非资本主义世界不复存在。因此，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矛盾不再是资本主义世界和非资本主义世界之间的两种异质性的矛盾，而是每一个空间内部的异质性（即差异化）的矛盾。而这种空间异质性矛盾的内在化，则是通过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实现的。

同时，卢森堡的批判路径是资本积累理论。正因为全球化是资本再生产的一种方式，因而，资本积累无疑在全球化时代占据了更为重要的位置。因此可以看到，许多后来的空间批判理论家都从资本积累的角度来分析全球化，无非他们在资本积累的内涵上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概念有所改变而已。在卢森堡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积累是以异质性空间为前提而展开的，即在世界范围内，存在着非资本主义空间和资本主义空间，这样资本积累才得以可能，殖民地问题才作为空间转移的表现形式而得以凸显。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刚性积累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被弹性的资本积累所替代。

虽然卢森堡的理论在其生前饱受批判，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卢森堡批判帝国主义的理论被重新激活并加以改写。公允地说，卢森堡从资本积累出发的帝国主义批判理论是从马克思到哈维的空间批判话语中不可或缺的理论环节。正是由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理论成为批判当代空间现象的有效工具，所以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批判理论家们注意沿着卢森堡的道路继续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空间背后的资本积累机制。

三、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弹性积累与差异性空间的生产

在垄断资本主义之后，资本逻辑又在新的社会历史阶段中进行空间布展。对于这一社会历史阶段，詹姆斯将其称之为“晚期资本主义”。空间维度的凸显是晚期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之一。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空间领域中的主题不再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所分析的帝国主义现象，而是空间的生产、流动和重组现象。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空间维度成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体系中的重要环节，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重心正在从“物的生产”转移到“空间本身的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已经成为一个不断超于地理空间限制，从而实现“空间的自我生产”的过程。如果说异质性空间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空间形态，那么差异性空间则是晚期资本主义的空间形态。

在后福特主义时代，资本的弹性积累在世界范围内重组空间格局。对于资本而言，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异质性不复存在。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开展，资本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均质化的空间。然而，均质化空间的出现并非意味着资本积累的终结，恰恰相反，均质化空间是资本积累改变模式的前提。当所有空间都被纳入到资本生产的世界体系之后，由于社会关系的再生产，而在各个空间内部开始了差异性空间的再生产。这种差异性空间的生产与资本的弹性积累模式是完全一致的。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差异性空间的生产经由如下的环节进行：

首先，后福特制的资本积累危机要求资本主义不断进行“空间修复”，“空间的生产”由此出场。所谓“空间的生产”，不同于“在空间中的生产”，是指空间本身根据资本逻辑的内在规律被再造出来，表现为空间的重构和重组。在列斐伏尔看来，资本主义危机主要是因为资本的过度积累所造成的，只要资本主义能够充分吸纳过度积累的资本，就能安然渡过危机。列斐伏尔注意到，在资本循环过程中，空间成为吸纳剩余资本的最佳载体。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各种城市建设等固定基础设施的投资来吸纳过度积累的资本，由此也就形成了空间的资本化和资本的空间化过程。这就是列斐伏尔的资本次级循环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的核心要义。

其次，后福特制的资本弹性积累模式要求空间与时间相分离，即“时空压缩”现象的出现。哈维用“时空压缩”来描述由“更加灵活的积累模式”所导致的时空体验方式的变化。他认为，生产

技术、消费与政治经济实践在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加速周转，这在某种意义上缩短了人们对时间的感受，而空间的障碍也因为劳动分工和货币流通的国际化而崩溃。正是因为时空的高度压缩，空间本身不断被抽象出来，有利于空间的快速重组，这与后福特制的弹性生产和灵活积累是相一致的。正如哈维所说“空间障碍越不重要，资本对空间内部场所的多样性就越敏感，对各个场所以不同的方式吸引资本的刺激就越大。结果就是造成了在一个高度一体化的全球资本流动的空间经济内部的分裂、不稳定、短暂而不平衡的发展。集中化与分散化之间在历史上有名的紧张关系，现在以各种新的方式产生出来了。”（哈维，第370页）

最后，后福特制的资本弹性积累模式进一步要求空间与具体场所相分离，从而进一步增强了空间的流动性。詹姆斯指出，“我们所称的后现代（或者称为跨国性）的空间绝不仅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或者文化幻象，而是有确切的历史（以及社会经济）现实根据的——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性发展史上的第三次大规模扩张”。（詹姆斯，2004年，第295页）与前两个发展阶段不同，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资本本身变成了自由浮动的东西，从它产生的具体语境中分离出来”（同上，第138页）。场所与位置不再固定，恰恰相反，空间呈现出了流动性，因此资本积累具有“去区域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随着信息化的高速发展，“一种电子计算机控制的空间”（同上，第150页），“为资本的转移消除了空间和时间的隔阂”（同上，第139页），大大提升了资本积累的速度与覆盖范围。

作为资本积累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的新形式，弹性积累模式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差异化空间不断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被生产出来，重新结构化为一种新的空间总体，从而满足资本的价值增殖需求。正如詹姆斯所说，资本的全球扩张既生产着标准化，又伴随着去中心化、差异化和多元化。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弹性生产的空间布局，原先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全球范围内的空间矛盾和对立现象也发生了重大改变。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全球范围内的空间对立具有总体性特征，即一方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是落后的非资本主义国家，双方在空间上对抗。然而，到了晚期资本主义，这种空间对抗模式不再是总体性对抗，而是差异化的空间对抗。资本的全球布展使得全球性与本土性相互交织在一起，本土性所具有的特殊性与其说是对全球性普遍化力量的对抗，毋宁说是资本逻辑的内在要求，因为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不仅是物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更是差异性的再生产。这必然会影响到全球化时代的空间生产，即使空间生产在生产出差异性的同时符合总体性的布局。与全球性和本土性相交织的态势相呼应，资本逻辑在空间布局上也呈现出了总体性与差异性相互交织的局面。

从马克思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到晚期资本主义，随着资本积累模式的变化，空间批判话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所理解的空间扩展主要是指资本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的同质化扩张和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同空间之间的对抗（如殖民地问题）；而当今世界的空间扩张已经不再是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之间的异质性空间的对抗，而是在同质化的空间内不断生产出新的差异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了社会形态从“人的相互依赖性”阶段到“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阶段过程中的空间转型。他更多关注的是资本主义在一定空间内的生产，而当今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不仅是在一定空间内的生产，而是空间本身的生产 and 再生产。马克思更多地是在流动资本的意义上理解空间的流动，而当今世界的空间现象使得固定资本理论得以凸显。在资本、技术、信息等高速流动的全球化时代，固定资本不断地参与到空间重组过程中，从而完成自身的价值增殖过程。当今世界的空间现象的新特征与经典的马克思资本批判理论之间的距离是时代所造成的，而非马克思的理论缺陷所造成的。

进一步来看，即使在晚期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对于当代空间批判仍然具有理论穿透力。其价值与启示主要体现在：

第一，交换价值的生产是空间物化和抽象化的内在机制。空间要想不断地流动和重组，其前提条件是空间本身要被物化和抽象化。只有当空间被物化后，空间才能被作为商品买卖，进而作为资本逻辑所需要的生产要素而加以利用；只有当空间本身被抽象化后，空间才具有同质性、空洞性和流动性，才能在资本增殖的本性驱动下被加以不断地重组。空间的物化和抽象化根源于交换价值的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的质的规定性和内在的丰富性都被抽象为可以计算和交换的“量”。只有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中，空间才能作为物化和抽象化的东西被纳入到资本增殖的逻辑中，参与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中。也正是在空间被同质化和抽象化后，资本才能实现“脱域”机制。

第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空间集聚的内在机制。在马克思的资本理论中，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代表了时间与空间两种维度的出场。相对剩余价值生产的着眼点在于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变化，而非工作日时间的无限延长，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劳动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的变化的重要性越来越得以凸显，越来越成为提高剩余价值率以及不断实现剩余价值增殖的有效手段。在此意义上，空间的集聚过程意味着工人通过集体劳动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消费，以及由此在一定场所内形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和管理模式，由此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为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服务。在资本逻辑的视野中，如果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生产空间得以重塑的内在动力，那么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全面变革就必须在资本积累的意义上加以把握，在资本积累的运行过程中，生产空间不仅是被简单地定型，而且也进入到了流动过程中，全面地介入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之中，只有这样，资本主导下的空间图景才能得以完整地呈现。

第三，资本的再生产是空间布局的内在机制。空间一方面在集聚，另一方面，空间又在分离。空间的分离和集聚都是资本主义时代空间布局的两种形式，二者看似对立，但都内在于资本逻辑的空间布局过程之中。资本要获得最大限度的利润就必须进行最大限度的生产，因此，扩大再生产就成为资本生产的基本特征，这必然导致空间中生产的扩张。人口和生产资料在空间中的重置和集中就是城市化。这是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开始于资本主义时代的根本原因。需要指出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资本再生产不仅是生产要素的再生产，而且也是社会关系本身的再生产。纵观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的分离，生产空间与消费空间的分离等布局，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生产的物化形式。

总体而言，正是由于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空间批判从原先的“隐形逻辑”逐步凸显为“显性逻辑”。无论资本积累模式如何变迁，空间批判话语如何嬗变，马克思的资本批判理论始终是空间批判理论不可或缺的理论地平线。

参考文献

- 哈维，2002年《后现代的状况》，阎嘉译，商务印书馆。
列宁，2001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卢森堡，1959年《资本积累论》，彭尘舜、吴纪先译，三联书店。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95年，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01年，人民出版社。
苏贾，2007年《后现代地理学》，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
詹姆斯，2000年《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年《詹姆斯文集》第4卷，王逢振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责任编辑：孟宪清